

〔印度〕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 著

甘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甘 地

[印度] 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 著

陈武俊 李运民 译 方 瑾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6号

Krishna Kripalani

GANDHI, A LIFE

National Book Trust, India 1982

根据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1982年版译出

甘 地

〔印度〕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 著

陈武俊 李运民译 方瑾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毫米32开 印张: 7.75 插页2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34 000 册数: 1-2 500

ISBN 7-300-01314-7

K·132 定价: 4.20元

译者序言

本书是印度著名作家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记述圣雄甘地生平活动的一部力作，初版于1968年。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传》、《现代印度：从拉莫汉·拉依到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现代圣雄甘地》、《印度现代文学》等等。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早年因参加争取印度自由解放的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从事教育工作。他是印度著名诗人兼政治家泰戈尔的挚友，1933至1941年一直与泰戈尔亲密共事，并任泰戈尔创办的《宝库季刊》编辑。后转入外事部门供职。1954至1971年任全国文学协会秘书长，曾获总统授予的嘉奖。1974至1980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甘地（1869—1948年）是一位外表平常、内心复杂而又令人困惑的人物，对于他，传记作家们因观察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或看法也各有千秋，甚或大相径庭。与其他甘地传作家不同，克里斯纳·克里帕拉尼没有把甘地神化，没有对他的成就重点着墨，大加渲染；而是把甘地作为一个人力图向读者展示其内心世界、所作所为及成为圣雄的经历，尤其是匠心独具地揭示

了甘地独特的人品性格。因此，本书初版时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新德里《民族先驱报》称它是“令人赞叹的传记：朴实无华、材料充足、清晰易懂、真实可信，从头到尾引人入胜。”孟买《印度插图报》赞誉“本书的出版对于了解甘地其人将是最了不起的贡献。”加尔各答《星期日政治家报》称颂“传记条理清楚……充满事实，引用了甘地文章中的话语，而非充斥着令人肉麻的吹捧或苛刻的批评。”加尔各答《印度斯坦旗报》认为该书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的最令人满意的传记”，等等。目前，我国像这样的甘地传记译本尚不多见，本书的翻译出版，对完整、全面、准确地了解甘地其人，研究他的思想，无疑将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书系根据1982年新德里“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再版本译出的。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方瑾同志的热情帮助，谨表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谬为感。

译 者

1989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一、诞生与教养	9
二、命运在召唤	15
三、故乡受挫	24
四、困境中的命运	27
五、接触基督教	33
六、律师与爱国者	38
七、命运的束缚	43
八、信仰与爱好	47
九、绿皮书	50
十、家长	57
十一、布尔战争	62
十二、印度的插曲	65
十三、重返战场	69
十四、个人的追求	73
十五、约翰内斯堡的家	78
十六、祖鲁起义	81
十七、挑战	84
十八、信仰的考验	88
十九、赴汤蹈火	93
二十、出使伦敦	97
二十一、海上对话	102

二十二、托尔斯泰农场	107
二十三、平静与风暴	110
二十四、告别非洲	116
二十五、孝忠帝国	120
二十六、回归故土	123
二十七、在印度彩排	128
二十八、乘风破浪	134
二十九、伟大的高潮	139
三十、荣枯盛衰	144
三十一、稳步前进	149
三十二、间歇期间的创造	152
三十三、进军途中	156
三十四、西方的插曲	159
三十五、圣诞礼物	165
三十六、生命的抵押	170
三十七、卷入大动乱	175
三十八、退出印度	181
三十九、在黑暗中摸索	187
四十、多条战线上的斗士	191
四十一、血染的黎明	196
四十二、孤独的赎罪者	201
四十三、独自行走	207
四十四、自由的代价	212
四十五、孤军奋战	219
四十六、决一死战	225
四十七、死而后已	236

前 言

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源远流长，充满坎坷。甘地的诞生，开创了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是自古以来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现在它已接近尾声。甘地诞生之际，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非常牢固。1857年的大起义——曾被冠以各种名称，如印度士兵哗变、大造反，或第一次独立战争——仅仅将一种商业上的冒险变成了一个帝国。这种隶属决非只是政治上的依附，知识和文化上的控制使得这种隶属极为牢固。所以，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一代心甘情愿地去从事“文明教育之使命”。从未有过如此诚心实意的服从，如此紧锁着的镣铐，如此完美的监护，如此卑躬屈膝的投降。似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并将永世长存。

甘地死于印度独立之日，全国都为失去他而哀痛不已。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又恢复了尊严；沉默寡语者又发出了呼声；胆颤心惊、畏缩不前的人们现在高高地昂起了头；被解除武装的人们锻造出了一种使大英帝国的刺刀丧失功能的武器。它是世界武库中的一种独特兵器，一种无需杀戮即可取胜的武器。

这种奇迹的史话也就是甘地一生的经历。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样成为这种历史奇迹的创造者和设计师。人民为此而感激他，尊他为国父。

如果认为是甘地只身一人带来了这种变化，似乎言过其实。任何个人，无论他具有何种才能，都不可能享有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的盛誉。先辈们用铁锹和刀剑铲除了充满恐惧、迷信和冷漠等毒草或荆棘，创造了条件。这样，甘地才得以运用自己的天才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战场，领导人民进行了争取自由的伟大进军。如果他早出生一个世纪，他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如果没有甘地的领导，印度也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一带来自由和荣耀的光辉历程，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出现的。人们一直在怀疑，这种方式是否还会再度出现。

甘地为自己的人民而生死，受尽磨难。然而他的一生并非仅对自己的人民才意义重大。后人永远怀念他，并非仅因为视他为爱国志士或改革的改革家，还在于他那种震撼人类良知的永恒精神力量。他为自己的人民而呕心沥血，是因为他生活在人民之中，人民的苦难和耻辱激发了他的精神情感和政治改革激情。他一生的教益值得世人借鉴。

如果他的伟大仅仅在于他对祖国的挚爱和他对富有成效的政治斗争的卓越领导，人民或许有足够的理由来感激这位国父，但却难以解释为何

全世界都特别怀念他或从他的言辞中汲取教益。当今世界国父如云，他们之中一些人 如果 不存在，世界也会照样前进，然而这个裹着缠腰布的虚弱而又皮肤黝黑的人，却并非只是他自己的人民的国父。

他的成就不胜枚举，而每一个成就都会令世人铭记在心。他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的自由预示了东南亚和非洲许多国家的自由。

他为那些一度被鄙视为“贱民”的人所做的一切意义尤其深远。他砸碎了几千年来禁锢着人民的种姓专制的社会枷锁。他坚持认为，应该用生活在乡村的千百万人的社会地位、道德水平和经济福利待遇以及获取这一切的手段来作为衡量自由的尺度。或许有一天，人们在既贪得无厌又严密管理的社会中，会效仿他所展示的那种生活方式。

甘地的逝世，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种成就。他的殉难使人民深感羞愧，使之不再发泄那种歇斯底里的仇恨和进行相互残杀。同时，这种殉难帮助了印度联邦共和国，使这个新生国家的世俗和民主性质得以加强。

然而，在这多变的世界里，人类的任何成就，不论多么伟大，都不可能永存或一成不变。甘地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或许会消失殆尽，而留给世人的则仅仅是一种回忆而已。但是甘地将永

存，他的人品比其成就要伟大得多。他是一个追求永恒真理与道德完美的多才多艺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更为关切的是制止人性的冷酷无情，而不是阻止我的人民受苦受难……如果我们是一上帝之子，共同分享天赐的精华，我们就必须分担每一个人的罪孽，无论这些人是否属于我们的种族。”

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于1938年写道：“正如同所有的民族一样，印度也有爱国者。他们和甘地一样，为自己的国家英勇献身，有些人所受的处罚远比甘地要多。甚至在宗教领域内，这个国家还有其他苦行者，和他们的困苦经历相比，甘地的生活相对来讲要快活得多。可是，这些爱国者仅仅只是爱国者而已，这些苦行者仅仅只是精神上的强者，作为人，他们受其道德力量的限制。然而，这个人尽管道德力量超乎寻常，但是他本人却似乎比这些道德力量还要伟大。”

甘地没有创立教会。尽管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却未留下任何可供其信徒挑剔的教义。他非常虔诚并忠于自己的信仰，毫无畏惧地摒弃任何他所否认的普遍道德与博爱法则。早在1909年，他的浸礼会朋友约瑟夫·多克就曾这样描述过他：“我一直在探究，是否有一种宗教体系能完全吸引住他。很难说他是个纯粹的印度教徒，因为他的观点太接近基督教。然而他又深受印度教的影响，但又不可能称他为基督教徒。而且他

的同情面非常之广，人们只能认为，他持有的是一种任何宗教准则都失去意义的观点。”

27年之后，甘地的部分同志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宣传他的思想的会社。他告诫说：

“并不存在什么甘地主义。我不想在我身后留下任何准则，我不想声称我曾创立过任何新的原则和教义。我仅仅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尝试，将永恒的真理应用于我的日常生活和问题之中……我所形成的观念及得出的结论，决非已达顶点。如果我发现另一种更好的准则，明天我就会改变我原来的观点。我并无任何新鲜东西可告诫世人。真理与非暴力自古由来已久。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这两方面尽自己的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尝试。在此期间，我时有失误，但我从错误中得到了教训。”

“我的全部哲学，如果能斗胆而自命不凡地这样认为的话，包含在上述讲话之中。你们不可以称之为甘地主义，因为这里面不存在什么‘主义’，更不必去对此进行详尽的解释或宣传。引用圣典是违背我的要求的。但我比以往更加忠实于我的信念，那就是，不应以任何借口来糟塌真理。任何相信我所阐述的基本真理的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宣传它们。”

甘地奉献给上帝的只有真理。除了诚实和通过不伤害生灵的手段进行不懈的探究之外，他不想通过任何仪式来获取它。因而，任何人都只能说

他是为所有的人去索取，而绝非仅仅为自己谋利。

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是，甘地绝非生来如此。尽管他使自己无可匹敌，但他早期生涯中所显示的一切才能与同时代的年轻人相比，并无差异。他有别于那些了不起的同代人，他不具备年轻的泰戈尔的那种诗人的天才，没有遭受过拉玛克里什纳的那种神秘梦幻的折磨，也没有受到维达卡南达的那种不可抗拒的热情的驱使。他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如果说他确实与别人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比多数孩子成熟要晚，比大多数人要文静、更腼腆，很长时期内一直饱受各种磨难之苦。

他胆小羞怯、外表简朴、学业平庸，毫不出众。作为一个青年，从他的体力和智力上丝毫看不出在他的身躯内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力，听不到压抑的隆隆声。在那平静的表面，没有闪现出火花，根本觉察不出锻造战剑的迹象。

这就好像上帝时时留心护卫着它自己所秘密锻造的稀有工具，并竭力避开狠毒目光的侵扰。它似乎要将这一工具藏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护套内，甚至这护套本身都未显示出其内部隐伏着生机的迹象或等待命运来临的预兆。在这个难以名状的年轻人身上，并无任何天才的表象，甚至连一点隐约的激情都没有。在平凡的童年时代，没有反复无常的狂乱，毫无任何冲破潜意识的激情和热望。

直到思想成熟并能承受精神迸发的压力时，这个欢乐而无意识的年轻人才具备了那种能造就同时也能毁灭很多天才和预言家的早熟气质。当他勇敢并轻而易举地获得这种气质时，他并没有畏缩不前、高傲自大以及喜争好斗。

确实，孝忠双亲、克尽职守、厌恶虚伪，这一切在这个学童身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所成长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品质并非特别令人惊奇。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在那种年龄孩子的心灵深处，埋藏着非凡的品质。

因而，人们或许从认识中得到鼓舞和勇气，如果这位普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而举世闻名，毫无疑问，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这样做来获得成功。如果一个没有亮光就不敢睡觉的胆小孩子——“我会想象着一面是鬼怪，一面是小偷，另一面是毒蛇，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能够成为最无所畏惧的人，那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甘地的天才——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在于他坚韧不拔、英勇无畏、孜孜不倦以及遵循永无休止的道德欲望而费尽苦心。当他跨过青年时代，他的生活则是一次努力奋进的长途跋涉，一种对真理的“从容镇定、毫不气馁”的追求。这不是抽象或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可以实现的真理。他以常人的步伐，一步步地攀登着。当他到达顶点时，我们看

到他似乎已超越常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己就是一位智力超群的人，他写道：“或许后代很难相信这位血肉之躯曾在这个地球上行走过。”如果最终甘地不同于他人，那么请记住，在一开始，他与其他人并无两样。

甘地一生教益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所幸的是，他自己为我们记述了重大事件，直至最后，他几乎毫无隐讳，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曾仔细而真实地描述了自己道德及政治意识的演变过程。如果没有他的描述，在我们这块轻信别人的土地上，就会不乏虔诚的编年史者去编造他诞生的种种神秘奇闻，甚至当他还在母腹中蠕动时，就会给他戴上神圣的光环。泰戈尔的话一语中的：

大师啊！您的言辞朴实无华，

可有人谈起您来，却大加赞颂。

甘地是政治家还是圣人？是政治家中的圣人还是圣人中的政治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是否如那些崇拜者所声称的那样，成功地使政治宗教化了呢？尊称他为国父的民族是否证明了这一点呢？子孙后代将会继续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此时，人们所能说的只是，不管怎样，他有别于同时代的任何人。泰戈尔在甘地去世的前10年就曾写道：“在使人们断绝邪恶的斗争中，或许他不会成功，或许他会像佛陀和耶稣一样遭到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对子孙后代是一种教益。为此，人们永远牢记着他。”

一、诞生与教养

1869年10月12日，莫汉达思·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波尔班达。这是卡提阿瓦半岛上众多的王公土邦之一，归属古吉拉特邦，现名绍拉什特拉。这个近似长方形的半岛，西面伸进阿拉伯海，北濒临卡奇湾，东南面对坎贝湾，北接芮因沙漠。

卡提阿瓦半岛一直是印度政治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多少世纪以来，它曾是许多游牧部落入侵的战场。这里遍布着300多个王公土邦，有的甚至比一个村庄还小，但是没有一个大于当时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土邦的统治者称为兰纳、塔考、或纳瓦布，均为专制君主。他们相互妒忌，喜争好斗，但又害怕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英国总督的代表。

在这种长期动荡不安、尔虞我诈而又专横武断的封建环境中，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曾有过他们的光辉时代。他们的很多业绩已经成为传奇，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在狂热的内乱中，变幻无常的环境培育了人们的性格，他们刚毅不屈，有着从事航海与经商的传统。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变得虔诚而又迷信。西海岸的杜瓦尔卡尤为如此。杜瓦尔卡是印度教的圣城之一，是

《薄伽梵歌》中克里什纳领主统治的都城。在印度教的传统上，又增添了耆那教及伊斯兰泛神论神秘主义虔诚行为的影响，其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印度式的风格——正统与忍让、冷淡与怜悯、宽容而节制。

甘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于一个吠舍中产阶级家庭。据说他的先辈原是杂货商，后来家庭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甘地的祖父乌塔姆昌德当上了波尔班达兰纳的帝万（即邦政府首席部长）。他性格正直、诚实，无所畏惧。兰纳死后，他因此招致摄政女王的不悦，被迫逃亡到毗邻的朱纳格特土邦，得到了穆斯林纳瓦布的庇护。当他站立在纳瓦布面前时，他举起左手向纳瓦布敬礼，并为此失礼行为作了解释。他说他的右手仍然立誓忠于波尔班达。这种狭隘的忠诚和封建时代残存的呆板礼教习俗的僵固状态，几乎延续到20世纪。纳瓦布宽容大量，对他的大胆回答颇为欣赏，不仅没有处罚他，还给予了特别的恩惠。后来，波尔班达新兰纳就位时，纳瓦布利用权势，使他重返故里，并得到新兰纳的欢迎。

乌塔姆昌德过世后，他的儿子又成为波尔班达的帝万。他同父亲一样，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但他诚实勇敢、性格坚定、经验丰富。甘地在回忆父亲的美德时说道：“他在一定程度上沉湎于女色，因为他40多岁就结婚四次。”这样做真是幸运，他的第四位妻子普特里拜为他生下了